

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投资移民期（上）

[日]原不二夫

一、国策移民论的兴起

如果按以往的方式进行小农移民，将不能大规模地输出移民，对日本过剩人口问题的解决和工业的复兴产生不了作用。这种论调以南洋协会方面的杂志为中心，实际上早在关东大地震之前就已出现。

首先，田泽震五的《南国见闻录》（1922年）中有如下记述。

打开这个宝库（南洋）需要钥匙……。钥匙……就是资本。……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巨大的钥匙。要开辟南洋未开垦的土地，仅有小资本是行不通的……更何況赤手空拳呢……。资本家阶级的人们……从将来永久地输出我国的过剩人员这种意义上看应该彻底地进行投资。（第77页）

1918年11月，南洋协会在新加坡开设了“商品陈列馆”（1927年4月改称为“商品陈列所”）。该馆从1919年1月开始发行《南洋经济时报》月刊。该杂志1924年10月因被《南洋协会杂志》收购而停刊，因此可以说是小农移民时代的私生子，但并没有留下积极的推进论。这大概是因为它着眼于上述的小农的窘境，将着重点置于对小农的救济。但是，1923年1—5月却连载了“应该在南洋兴办移民事业”一文，做了如下叙述。

（因经济萧条40万人失业，另外每年有70万余人出生。）作为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只有依赖海外移民政策……。（1923年1月号，第2—4页）

最近听说在新加坡出现了一个日本乞丐。日本人当乞丐关系到全体同胞的脸面，因此某日本人为了对其加以惩戒而一直寻找他，但其后却再也不见他的踪影。该乞丐信口开河地说，见到日本人的话，他们会唠唠叨叨地说什么面子啦名誉啦，所以不想见，在不用劳动轻松过活的地方，根本不要做忙碌劳作的蠢事。南洋对那种没有志气的懒汉来说的确是一个乐园。但对想要劳动赚钱的人来说并非快乐的天地……。

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等廉价劳动力有很多……他们很能忍受炎热天气下的劳作……日本人……并不能与这些工人竞争……。在马来半岛……没有一个将日本人用作纯劳工的橡胶园。过去曾经用过，但似乎都以失败告终。……（南洋）作为劳工的移民目的地是不合适的……作为企业家的移民地确是很适合的。……企业家移民就是投资移民……。对无财力者应该给予其资本，使之移居南洋，成为小规模企业的主

体。(同年2月号,第1—4页)

其宗旨是向本国人提供资金,让其移居南洋,分给一定的土地,让其作为该土地的所有者从事开垦事业。(每人分配10英亩土地,可雇用“土人”5名左右进行开垦。在每个移民的经费1200海峡元(以下简称“元”)当中,300—500元由自己负担,其余的由政府贷给)。假如每个移民贷给500元,5年期间让5000人移居,便需要350万元的资金……。头3年可不必还款,从第4年开始……返还,直到全部还完。……

既然不适合民间的事业,而且其根本目的是救济无职业者或解决人口问题,就应该作为国家的事业,由国家对此提供资金。但是,在对外关系上国家不适合或不可能自己进行运营,因此应以上述资金为基础,加上热心的投资者(如果有的话——原注)的牺牲性投资资金,组织一个社团,让该社团担当经营之职……。 (同年3月号,第1—5页)

显然,论者在论述不可能进行劳动力移民时考虑到了前述的移民事业的失败。作为替代劳动力移民的事业,这里提出了依靠贷款的小企业、即小农的移民。虽然因日本国内的失业者骤增而痛感移民的必要性,但劳动力移民已经不能提倡。另一方面,小橡胶园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向没落,是极为有限的。他认识到余下的手段就只有拥有稳定资金基础的勤奋的小农了。但在马来半岛,这种形式的移民直到3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而且南洋协会本身参与其中,移民数量、贷款金额都极为有限。因此,1923年提出上述论调只是起到了怂恿没有补助金和贷款的刻苦勤奋型自力小农进行移民的作用。

但是,在各种有关驻马来亚日本人的记录、文件中,日本人乞丐仅在《南洋经济时报》中出现,因此斗胆加以引用。该刊在大地震后的1924年也反复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即:

南洋要看用什么方法可成为适合的移民地(……贷给移民资金,使之成为小企业的主体——原注)……其经营不让营利公司实行,而是组织一个公营团体进行经营,而且由政府全额提供或补助资金……。 (“评论:南洋日本人产商业发展政策”,1924年6月号,第4页)

不可思议的是,其后该“评论”出现了大量的缺字。列举了可能的移民地之后,便是“○○如果日本进行移民,其个人所有地约15英亩(这一点与○○有关,将会给○○○○增添麻烦)”将会○○。实际上○的数量少则6个,多则21个,累计67个。文章开头有“除了顾忌发表的部分”的叙述,因此这是考虑到给谁添麻烦而删除的。也许与其后的往北婆罗洲的移民事业有某种关系。

《南洋经济时报》在出版了最后一期1924年10月号后便被《南洋协会杂志》收购。这里重新把目光转到经历了大地震的《南洋协会杂志》,可以看到以下这种论调。

(在南洋)体力劳动力没有移民的余地……。也出现了制定移民政策等的倾向……,(为了实行该政策)组织了财团……将集中了官资民资的金额作为财团的资本……。 (台湾银行董事久宗董:“对南洋发展与金融问题”,1924年11月号,第9—11页)

既然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移植民问题,新设托殖务省比起农林省的独立更是当务之急……。 (台湾银行董事久宗董:“对南洋发展与金融问题”,1924年11月号,第9—11页)顺便提一下,托务省是在1929年6月设置的。

从这时开始，政府、南洋相关人员之间似乎在悄悄地制定有关新形式移民的计划。1924年8月，外务省委托在北婆罗洲经营水产事业不久的元台湾总督府副官兼海军参谋折田一二“调查有关日本人殖民的事项”，1926年4月委托该人进行“本国移民的迁居、实际耕种调查”。1926年底，折田从外务省领到2万日元的“迁居、实际耕种调查费”，将5个家庭迁居到了斗湖。

而且，同样在1926年4月（21日），新加坡总领事中岛清一郎针对币原喜重郎外相的有关“1927年度移民科预算编制参考”的机密指示做了如下答复：

往南洋的移民如屡次报告那样……工人没有着落。……因为不能与耐劳、低工资的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竞争。因此……必须要有稍微有些购买、开垦土地等的资金、可以役使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等的人、即小地主的移民……。需要一些资金和领导这些人移居的机构……。

本官提出的移民实施试验方案（1925年7月1日）、南洋移民资助基金制度方案（同年9月16日）等仍然……可以认为是妥当的，……并认为下列举措是合适的，即新设施聘用1名专任雇员，并附以助手，一方面进行以上述小地主移民为目的的土地及企业方面的各种调查，另一方面指导实施极小规模移民……。

如果先前按移民委员会提出的目的在本省移民科筹划的南洋劝业移民公司……得以设立，一般的大规模移殖民应该能够得到实行……。

此时依靠政府的补助及民间的捐赠建立一定的基金，将这些基金的利息用作资金。……实行调查乃至指导……兼做移民事业，这是最实际的……。

中岛在该“答复”文章中表明了将来的方案：“收购数千英亩，每1户移民（4人）各分配25英亩，并预先贷给橡胶采液期之前的各种费用（每户7500元）”，但自己却有些畏缩，认为“投入巨额资金也有弊端”。并且作为1927年度的预算，除了2户的“当地试验费”5万元之外，还准备提供“专任雇员”、“助手”等所需的“调查部经费”13910元。

这显然与《南洋经济时报》1923年3月号中的内容类似，可见在当时相关人员之间已摸索、探讨了新形态的南洋移民。1930年4月，新设立的拓务省替代外务省任命南洋协会的堺理喜太（日本人橡胶公司工程师）、南兴橡胶股份公司的照屋全昌（南洋协会会员）为总领事馆雇员。

与这种动态关系最深的南洋相关人员是“南洋协会”专务理事井上雅二（1920—1938年在任）。井上也是“海外兴业股份公司”的总经理（1924—1936年），他当时参与兼并了许多移民公司，并一手经营了移民事业，后来被人们称为“移殖民之父”。井上在《南洋协会杂志》中做了如下叙述：

征服领土并进行剥削后毫无所得的、以往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终于结束，世界的趋势朝着国际协调、增进全人类平等幸福、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进展。……在制定我移民政策时……应该明确移殖民的概念。（此概念）在于以人口的移植作为其本质。……第一……要与伴随政治权力的所谓殖民政策区别开来，第二要将有关人口移植的单纯海外投资转到一般的资本对外发展的范畴……使其包含在移殖民运动及政策中……。

我国的移民政策以关东大地震火灾为转机对以往的政策进行了修改。即过去我国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基本上应该说是放任主义，没有任何应该大书特书的政策及设

施。然而……考虑到关东大地震火灾所造成的大量失业者及国内人口连年激增而使国内问题愈加严重，政府为了救济受灾失业者，……以补助路费的形式……开始（对移民）实施积极的保护奖励措施……。到了1926年11月，便表明了日本移民政策的（3点）基本方针……。

第一，对企业移民的奖励。以往主要……致力于输送劳动力移民，但……将来也要同时鼓励携带资本的企业移民……。（井上雅二：“关于我国移民政策”，1927年9月号，第59—60页）。

井上成为了1927年内阁成立的“人口粮食问题调查会”的委员，并于1928年提出了如下“人口问题对策”。

对海外移民实施奖励……将会救济失业者及生活困难的贫民，在海外给予其工作，并稳定其生活，以此缓解和消除紧迫且频发的以人口问题为核心的社会问题……。如果尽速……启发善导国民的思想，奖励促进其移居，民众都会毅然移居海外……。

为了繁荣海外移居事业，……要调查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如果认为适当）首先进行3年小规模的小规模的试验性移居，积累了业绩后再施行本计划……。

井上在其著作中还做了如下论述：

在有限的国土上拥有无限的人口，这并非根本的策略，……要放眼太平洋彼岸，默默地输送人员和资本。除了建立这一百年大计之外，没有永久生存的途径。

由于缺乏劳力和资本，尚未得到开发的国土甚多……如果真正地期望移殖民发达，就不要停留在把日本人作为劳动力输送到海外，务必要有资本伴之……。令海外移居困难的一大原因是移居费用筹集困难，因此政府……必须给予相当的补助。

我们主动向该地投资……是永久的计划。……该地产业的不景气使得投资对象物（橡胶园等）的价值降到了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而日本现在（1933年前后）处于低利率时代，银行资金过剩……。

（南洋）作为资本殖民地，如果资本家、企业家首先不断输送优秀人物，……工人也随之前往，那么将会逐步从资本殖民地转化为移居殖民地。

从井上的论述可以明确地知道，当时输送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资本的理论。就是说移民输出是顺利进行过剩资本输出的必要条件。井上的这种论调大概对政府的移民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南洋协会杂志》也出现了从确保资源方面论述移民的主张。

我国财富贫乏，国民收入低下……不仅无法获得殖民地，而且在海外的……经济活动……也不充分。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必须到海外去生产主要原料。……应该大量地进口，生产为成品后再大量地出口。……如果海外的原料物资经日本人之手……进行生产，……人口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人口的增加也会受到欢迎……。（协会主任饭泉良三：“人口问题对策与向南事业”，1928年4月号，第2—4页。同样的主张在1929年8月号、1930年1月号中也可见到）

这也可以说是“开发进口”论的鼻祖吧。但由于这是日本人移民所进行的原料生产，其生产者与近年的事例完全不同。

该刊还登载了当事人对仅把移民用于处理过剩人口的风潮表示不满的心声：

人口的增加表明国家旺势，值得庆贺，但这里却有着把增加的人口作为极其麻烦的人加以处理的倾向。而且听其口气，仿佛只有自己才是一家之主，其余的则是未经许可出现的食客……。（江川俊治：“南洋发展与两个难题”，1928年5月号，第96页）

这是移民们针对当时以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前提的移民论所进行的自然的反驳。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看到该刊中的这种批评，而且该文也不是对移民事业本身的批评。标题的“两个难题”指的是“结婚难、教育难”，作者只不过号召“为了实现南洋发展即移民事业，必须解决这个难题”。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30年前后的这种趋势中，1929年出现了沙捞越“实际耕种稻米调查”、1930年出现了马来半岛“移居计划调查”、1932年出现了北婆罗洲“移民地调查”，不久便分别实施了移民事业。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叙述，这里拟探讨一下这个时代移民论的另一侧面。

二、人口公平论与和平投资论

这个时期，认为“世界人口应该公平分布”的人口公平论或人口均衡论、认为“日本进入南洋是经济性的、和平的，与侵略无关”的和平进入论甚嚣尘上。这里来看看具有代表性的论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苏门答腊经营制糖厂和橡胶园的藤山雷太在1927年著的《南洋丛谈》中做了如下叙述：

仅拘泥于国内的话，……失业者增加……将遭遇很大的困难……。如果不向海外发展，……就不能期待国运的增强……。像以前那样以武力侵略其他国家的领土，今天的时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此后的海外发展，……是密切经济上的关系……是作为经济领土。……从世界的各方面来看，经济上的势力范围大体上已经到了极限。唯有南洋方面……足以对促进我国运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我土地狭小……彼（南洋）尚有广大无限的土地。我苦于人口过剩，彼容纳人口仍绰绰有余。我天然物产匮乏，彼天然物产及原料产品富饶无比。……必须将南洋方面作为经济领土，作为我产品的销售市场，作为我投资之地，还要作为我人口的去处……。

藤山并没有言及“投资移民”。但由此也可知道当时企图进行的大规模移民只有与资本投入同时进行才能够实现。移民本身是否携带一些资金并非什么大问题。

井上雅二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断，他显得有些异想天开：

海外移民运动……在把该国过多的人口移植到其他国家这一点上是有助于解决人口问题的，从接收移民的国家来看，在开发未开发的丰富资源这一点上是立足于国际主义的拓殖运动。……移民运动是一种神圣的运动，它不仅把各种文化在地理上均匀地分配，而且帮助其统一融合，对世界和平、人类协调做出重大贡献。移民本身也应称为这一圣战的斗士。（1930年）

井上是当时的代表性南进论者，是被称为“移殖民之父”的最大的移民促进者和移民

事业推进者。以下逐一来看看太平洋战争之前的他的主张。

我国的南方国策是和平的和经济性的，是相互依存主义，是共荣共益方针，丝毫没有侵略的野心，没有想得到领土。（1936年）

由于有资源的国家和没有资源的国家……的对立，资源偏倚，人口分配不公平……。近卫内阁成立时（1937年），人们称之为国际正义的确立。……所谓国际正义……，不外是人口的公平分布、资源的公平分配。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人口问题具有正义，这是最重要的……。（1937年）

所谓的使人口问题具有正义大概就是在人口密度相同之前不断将移民输送到各“未开发地”之意。

（日本的海外移居）是基于道义的民族自然的欲望。（1939年）

（日本）有着主动将南洋作为我经济发展的舞台、获得其经济力量并影响到亚洲整体、进而掌握世界和平的决定权的重大责任。（1939年）

（井上的南洋开拓公司——南亚公司的设立）是复古到神武以前，在天南制定其传统的宏图……恰是辅佐天皇事业的“圣业”。（1941）

如果想去别国领土推行天皇的政道，或如果想要实现我共荣圈，就必须将资力投到该地，将人才送到该地。（1941）

“投资移民”事业与当初的“和平的经济性的进入论”相反，必然要完成大东亚共荣圈。

大东亚战争的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实现及亚洲10亿人的解放都在于参与将其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于得到“南方之土”的人并将这些人大量地移植到南方各地区，我大和民族成为核心指导、陶冶各民族……，这是绝对条件。……通过输出数百万具有开拓者精神的人，方能成就大业。笔者之所以能够道破预先调查预定移植地区，以确保将来大和民族的大量移居……的皇国的永久大计，是出于笔者根据多年的实践所得出的结论，是一种信念……。（1943年）

有人认为南方是热带瘴疠之地，不适合我民族……决不是移居地，“南方痴呆”论就是最好的事例。……这些都是缺乏认识的目光短浅者的言辞。（1943年）

日本的马来亚统治、南方统治确立后，井上便认为实现移植事业设想的环境已经形成。就是说，且不论当初是否预想到，他的移植设想在实行军事占领后才得以实现。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占领了马来亚的日军并不允许日本人迁居。因为依赖橡胶、锡等出口产业的马来亚经济受到破坏，完全没有余力移入日本人移民。例如，1942年3月13日“马来军军政部”次官宣布的“马来建设大纲”写道：“关于日本人的移入问题，……不搞满洲那样的移入奖励。首先要移入土著农户，但也要严加选择”。从日本及拘留地返回马来亚的日本人原居留者有相当多，但极少有人回归原来的农园，基本上都作为翻译等文职人员协助军政。马来亚脱离白人统治，在实现“圣业”上具备最好条件的同时，“圣业”、即移植事业便不可能进行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战时井上的境遇并不好。他感叹道：“尽管世人把自己看作南方问题的第一人，但大东亚开战以来连南方关系的大东亚○○○会和○○○○也没有请自己参加”（原文如此）。自己提出的“大东亚”竟抛弃了自己。

另外，井上所批评的“南方痴呆”论的典型如下所述。但不知他是否将此文放在心上。

我担心日本民族的纯洁的血流淌在物资丰富但无刺激、过于安乐的南方世界……。在日本本土，无论人口多么过剩，将他们输往南方就如同主动将日本民族抛弃到南方低文化民族中去一样。不，与其说是抛弃，……不如说由于日本民族之名反而给大东亚共荣政策留下祸根……。我绝对反对向南方移殖民。（多田礼吉：《南方科学纪行》，科学主义工业社 1943 年，第 240 页）

这位“科学家”主张，“当地人是基本上不会做生意和经营工业的低能者”，因此不要移民，要短期轮番输送科学技术人员和中小工商业者。我们的目的是在国内重点搞重工业，让轻工业对南方当前的日用品生产起到作用，驱逐华侨商人。因此，他在统治者意识上与井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关于移民则完全是相反的立场。

下面来看看其他权威南进论者的论述。

石原广一郎 1916 年以获得 20 英亩橡胶园向马来亚迈出了第一步，1920 年以设立“南洋矿业公司”（1929 年改为“石原产业”）一跃成为南洋日本人之间的重要人物。他以成功的经历和资金力量为背景，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本国内亦成为最有权威的南进论者之一。其南进论亦基于“人口公平”论。

我国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奇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促使民族积极地向海外发展。而且海外发展除了发展民族的移殖民和贸易以外别无他法。……南洋诸岛……假如将来每平方公里容纳 50 人，实际上可消化相当多的人（英属马来亚 231 万人，英属婆罗洲 945 万人等，合计 1 500 万人）……。（1934 年）

从事前往南北美、满洲、南洋的移民事业的民间移民团体“力行会”（1897 年设立）的第二任会长（1913 年就任）、通过小川平吉等与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的国家主义者永田稠于 1933 年做了如下论述。

日本的农村……已经陷入停滞状态……现在日本的农民必须从勤俭主义和改良主义（指土壤、品种改良等）的框框中走出来，向开拓主义、世界性建国主义发展……。开拓主义……伴随着移居……。农民……必须从海外获取自己的农场和耕地……。

全世界的大部分土地被英国人占有、支配，而且拒绝各地民族的移居，全世界的土地并没有在需要的民族之间公平地分配，这使得全世界的生产很不平衡，引起了全球性人口问题。

永田也与井上雅二一样，在占领期间主张进行大量移民。

日本内地的农户……约 290 万户……约有 1 600 万人的过剩人口。……南洋邻近日本，且气候温和，建筑不需资金……移民者到达目的地后 10 天便可种植蔬菜，3 个月可收获大米……。移居者赤手空拳地乘船前往该地便可生存下去……。万不得已还可强制移居。（1942 年）

（马来亚的）橡胶山向集体移民开放。而移民可组织产业合作社。（1942 年）

永田平时主张“民族的势力分布以铁锹最强，剑次之，算盘最弱”，在《南方新建国》（日本力行会 1942 年版，第 133、134 页）中也强调“移民跟军队走”（第 239 页），“如果日本民族要坚定不移地从事南方建设，在使用资本和兵力的同时，农业移民、即以铁锹开拓是绝对重要的”（第 253 页）。大概这一主张被认为是对南方军政的中伤，或军部对“大量移民论”脱离现实感到了厌恶，《南方新建国》受到了禁止发行的处分。而且“战时……

（力行会的）海外发展工作已经难以进行”。永田遇上了与井上同样的命运。

但是，太平洋战争中不能公开提倡“人口公平”论，一般以“输送领导人”论的形式提出。例如野间海造做了如下论述：

开发东亚共荣圈，必须将优秀的日本领导人输送到海外分散定居。……

可以向南洋等移民的农户……至少有 145 万户，……农户人口不下 580 万人。

内地农村及农业毫无收容人口的能力，这使得人口的增加形成了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压力，增加的农民才要老老实实在地将移民作为至高无上的命令来接受。

把由日本农民组成的农村领导人散布到东亚圈各地，以此为核心谋求原住民农业的进步。

即使原则上提出“为领导而移居”，但实际上还是为了处理农村过剩人口。尽管如此，笔者并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意向，而且也没有考虑到被送出的移民的立场。移民只有“老实实在地”遵从“至高无上的命令”。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的移民政策乃至南进政策的特征。

但总的来说，如前所述，战时南方各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还不能接受来自日本的移民。

下面再以《南洋协会杂志》（自 1937 年 5 月号改为《南洋》）来验证一下“公平论”和“和平论”的变化。

我日本人向南方移居毕竟是经济性的与和平的，南方各国完全不必对此感到恐惧。……南进论突然兴起，是我国民觉悟的自然流露，南方各国难道不应该虚心坦怀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吗？……站在至公至平的立场来看，可以增进彼我共同的利益，主动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评论：对南方的认识”，1936 年 4 月号，第 2—3 页）

英国方面认为 1936 年是“南进无疑被纳入日本政府的正式方针的年份”。同年 6 月 30 日，陆海军两省拟定了“国策大纲”，即“根本国策……在于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投资南方海洋的发展……”，“策划在南方南洋、尤其是在外南洋方面谋求民族发展……通过采取逐步的、和平的手段……策划投资……”。8 月 7 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之间同意了内容大致一样的“国策基准”。不可否认，井上雅二和南洋协会的主张对这一“国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6 年 12 月 8 日的某外国报纸出现了这样的报道：作为日德防共协定的一个余波，日德两国密谋在南方的外国领土扩大两国的势力范围。……我南方国策是绝对和平的和协调的，既然其根本要旨是经济合作，而不是其他，就应该对此等不谨慎的报道和轻率的言论加以控制。……南方各国也没有听信当时常有的流言蜚语，……仍热切期望走上共存共荣的大道……。（社论“国际亲善与言论统制”，1937 年 1 月号，第 2、3 页）

从自然地理来看，南洋的开发只有我国来做才是最合理的，是自然的约定，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便被打开，全世界的人类因此享受巨大的福利……。（序言“大陆政策与南方政策”，1938 年 8 月号，第 1 页）

（殖民地）非所有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极力不使所有国感到政治威胁，同时所有国必须通过为全世界开放其殖民地……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佐藤尚武“关于我国的经济发展”，1938 年 11 月号，第 2 页）

我对南企业及贸易的进展未必与该地的利害一致，而且满洲事变（1931年）以来对我国的……感情未必消释，……仍然限制日本人入境、……乃至日本人旅行的自由……。应该实现与南洋各国的和平合作，体现有真正理解的共存共荣……。

确立包括南洋在内的东亚共荣圈是解决事变（日华事变）的最大着眼点……。（序言·渥美（育郎）“南方问题与东亚共荣圈的确立”，1940年8月号，第1页）。

为了实现支那事变，也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其（南洋的）重要性就更加大了……。这便是1940年8月1日松冈外务大臣主张确立包括“日满支”、南洋在内的东亚共荣圈的关键所在……。（饭泉良三常务理事：“告知国内同胞南洋日商的活跃”，1940年9月号，第21页）

此次诚惶诚恐地拜受诏书，知晓大东亚共荣圈国民的一大指导目标，即把南洋一带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一环，此乃帝国不可动摇的国策……。向南！向南！这才应该是我一亿同胞的新口号。（序言“南洋发展的当务之急”，1940年11月号，第1页）

（1940年）6月底……有田前外相在表明帝国外交目标的广播中说道，“东亚各国与南洋各地……有着为实现共存共荣，以此增进和平和繁荣的自然的命运。……”（另外，松冈外相还说明大东亚共荣圈包括了南洋），这应该就是正式出现在世上的“作为东亚共荣圈一部分的南洋”这一新说法……。（井上雅二“东亚共荣圈与南洋”，1940年11月号，第11页）

需要极大努力去实行经济南进的时机进一步迫近，事态已经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南进以和平的共存共荣为基本……。阻碍自由活动的许多障碍尚未消除……。（武智直道：“序言：关于经济南进”，1941年5月号，第1页）

20世纪30年代，南洋协会的相关人员似乎也相信南进“是和平的和经济性的”。但是，“和平的经济南进”无论在投资方面还是贸易方面以及移民方面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宗主国对日本经济活动的限制和贸易限制、移民入境限制等）。而且在1940年中期出现了“包括南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时，可以说“和平”南进已完全行不通了。其后的“和平南进”论的下列含意就更强烈了。即：如果不被接受，就只有“勇往直前”、即诉诸武力了。因为，要随意地让资本、商品和人员“和平、经济地”南进，只有依靠武力占领。

30年代，为了处理日本国内的过剩人口，便倡导向人口稀薄的南洋地区移民。数百万人到1000万余人规模的人口仅靠小农移民是不可能实现的，何况由于20世纪10年代失败的劳动力移民，几乎无望招到移民。于是，由大企业或半官半民的“社团”所进行的移民、即“带资本的移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投资移民”便被提出并得到实行。莫如说这个时期处理过剩资本的必要性比处理过剩人口的必要性还要大。正因为这种形态只能在殖民地宗主国与日本之间的“和平”状况下才能实现，因此才提倡“和平的经济性的”南进，并提出了人口公平——正义论。但以日本所希望的规模来进行这种资本与移民的同时移动，只要南洋不在日本的主权下就不可能实行。于是便提出了“包括南洋的大东亚共荣圈”论，不久便发动了“大东亚战争”。

（原不二夫著《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1986年3月，亚洲经济研究所）

乔云译